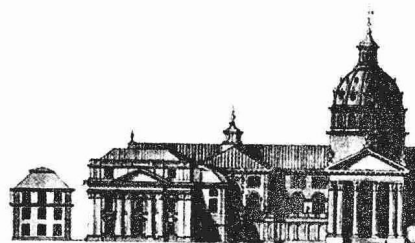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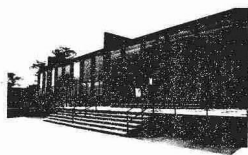


建筑学术文库

现代思想中的建筑

李士桥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知识出版社



内容提要

建筑既是思想的产物，也是创造思想的手段。本文集以“现代思想中的建筑”为焦点，从多文化、多空间的角度来讨论这个中心论题，关注现代化的多个领域在建筑中的体现。本书共分为三部分，包括了论述英国建筑与早期现代思想的关系，中国建筑与中国20世纪初的现代化的牵连，以及建筑评论；涉及的思想领域主要集中在科学理性与建筑，民族国家与历史，品位与美感，以及理解培养“制作技艺”的重要性。

本文集适用于从事建筑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对建筑学专业的师生及相关从业人员也颇具参考价值。

选题策划：阳 森 张宝林 E-mail: yangsanshui@vip.sina.com; z_baolin@263.net
责任编辑：阳 森 张宝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思想中的建筑/李士桥著.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建筑学术文库)
ISBN 978-7-5084-5740-6

I. 现… II. 李… III. 建筑史：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TU-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0411号

建筑学术文库

现代思想中的建筑

李士桥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6号；电话：010-68367658)
知识产权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电话：010-82005070)
北京科水图书销售中心零售 (电话：010-88383994、63202643)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经售
北京城市节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印刷
175mm×260mm 16开本 15印张 346千字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册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邮政编码100044，电子邮件：sales@waterpub.com.cn)

前言

我的视野也许来自一个建筑实践者。建筑实践是建设城市环境的基础，为特定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具体、持续和日常的表达；在这个具有长远和深刻影响的工作中，建筑实践者应作出自觉的选择，而非不自觉的建造。这本文集希望以“现代思想中的建筑”为焦点，从多文化、多空间的角度来讨论一个中心论题。现代思想不是自然现象，也不只是与传统的单纯对立，而是人为的对特定生活的理想构思和行动指南；这样，我们可以说现代性是现代思想的抽象特征，现代化是在这些思想作用下的社会变化过程，而现代主义是在这个过程中对有意或无意结果在文学、艺术和空间中的自觉创造。同时，从20世纪以来，现代性经常被理解作为一种身体的经历（不同于哲学系统、发展过程、艺术创造），一些对于现时的飘浮、时间空间的断裂、传统的破碎等生活特征的感受（所谓漫游者“无家可归”的经历）；这些正面或负面的感受来源于现代系统、科技及消费文化对个人经历的影响，这在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诗歌和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著作中有充分的表达。¹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现代思想的各个层面并没有固定的因果关系。从一般原则上来说，现代思想培育了平等、自主和多元的空间；不难相信，封闭和控制是人类群体的自然倾向，而平等、自主和多元空间则需要艰辛的培育和坚定的维护。现代思想是对生活方式的自觉追求，但这些基本概念的具体表现却十分复杂。一方

1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David Frisby, *Fragments of Modernity* (Oxford: Polity, 1985)。在欧洲20世纪早期建筑中的体现，参见 Hilde Heynen, *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 A Critiqu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9)。

面，虽然现代性在某个地域和时期（如欧洲启蒙运动）可以被认为科学理性，但在具体运用中却存在源于不同地理、文化、时代及个人中的共识和非共识部分，这个情形经常会出现于同一作品或个人中；另一方面，从今天全球的角度来看，现代性似乎又可以被认为是多重的；也许我们肤浅的科学知识和笨拙的技巧限制了我们的视野，阻止了我们认识现代思想另类的可能性。²

2 Scott Lash, *Another Modernity, A Different Rationality* (Oxford: Blackwell, 1999).

3 20 世纪现代建筑的经典史学家，如西格弗里德·吉提翁（Sigfried Giedion），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亨利·鲁塞尔·希区柯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等都将 20 世纪现代建筑与巴黎美术学院的关系理解为绝对断裂。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 19、20 世纪马克思、Émile Durkheim 和 Max Weber 为代表的社会学之中“社会变化规律”观点。Berman 在他关于现代文学的著作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中仍然把现代化分成整齐的三个时期：16~18 世纪、法国革命及 20 世纪，第 16~17 页。今天许多关于建筑现代性的论著仍然以 20 世纪建筑为中心。

现代思想在字面上和内容上存在着一个很容易造成误解的差异。现代性不是时间上的概念。当 17 世纪科学家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等哲学家的影响下挑战古典传统时，他们曾将自己称为“现代人”（The Moderns）；从这个视点来看，现代人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在 20 世纪，出现在艺术和建筑中的现代主义则十分重视其“划时代”的意义，这明显受到以 G. W. F. 黑格尔（G. W. F. Hegel）的历史学为代表的有关时间的“断裂”性发展模式的影响；这里，现代性被理解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³ 纵观各个历史时期，这种断裂情节似乎仅仅是表面的现象；“旧”的传统总是以不同的表象在“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词汇中重新出现，包括无意识的重现和有意识的重构。划时代的模式在后现代的概念中也同样受到质疑。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这两位对后现代一词的传播起了最大作用的学者，都认为后现代并不是划时代的概念。⁴ 后现代主义与巴洛克文化的联盟就体现了后现代性的“跨时代”特征。从现代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后现代思潮的出现给现代思想带来了重组的机会；⁵ 虽然后现代思潮有其为难的处境[它所指出的“将来”却是一个不可命名的“之后”；它所强调的“现时”（presentism）又孕育了肤浅和激进]，但它的出现深刻地冲击了现代思想的根基，打开了思维空间。一方面，现代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欧洲启蒙运动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并提议我们仍然可以从过分拘谨的各种“系统”（system）中重新维护和夺回个体和群体空间（lifeworld）。⁶ 另外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哈贝马斯仍然在传统启蒙运动的现代思想的框架里思考。他们指出，传统的现代思想是“反思性现代化”

4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5 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一些定义和分析，参见 Mike Featherstone, “In Pursuit of the Postmoder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5 (1988); Bryan Turner, ed.,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6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I: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 Thomas McCarthy (London: Heinemann, 1981).

(reflective modernization), 而今天的现代思想应该是“自反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 是一个与“风险”不可分离的现代化。⁷ 前者的思维逻辑是以固定的框架为基础来扩展内容, 而后者则在接受变化和差异的现实的基础上, 用动态的框架来指导行动。这个结论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 它基于对过去现代化的一些负面后果的批评, 如过分依赖理性系统而没有反映出世界的复杂性, 以及过分索取自然资源而导致生态的灾难; 另一方面, 这个结论也建立在很多学者最近所描述和分析的社会、经济、城市、艺术的实际或想象的变化, 如由固定结构转向“流动空间”和相应的时间观念的变化 (Manuel Castells)、民族经济和文化向全球化经济和全球文化的转变 (Saskia Sassen)、对人类生活“空间性”的认识 (Henri Lefebvre) 丰富了“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想框架, 引发了对具有复杂性和混合性的“第三类空间”的关注 (Edward Soja) 和对空间的“公平”概念的理解 (David Harvey), 等等。

基于上述的描述, 现代化应该理解为互相关联的、不断变化的以及可以重新构成的“领域”。这也许是现代化很难用单一模式来理解的原因之一。每个领域都有其中心内容, 也有其独特发展的过程, 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理位置。⁸ 例如, 同样是现代化的主体内容, 对个人和群体的独立决策权的维护 (个人自主和民主政治), 其发展持续了 2500 年, 从希罗多德 (Herodotus) 对古希腊抵抗波斯帝国侵略的描述, 到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对不同政治力量均衡的信念, 再到今天亚洲各国对民主政治的追求; 这个现代化的内容一直占据着人类生活的中心地位。而在另一个例子里, 女权运动从萌芽到现在则只有一个多世纪。同样, 在 20 世纪非现代的集权政治和不同种族之间的摧残通过工业化引发的残酷升级, 充分说明了现代化似乎是一项无止境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现代化是不断在组成的“过程”和不同程度上现代性的实施, 而不只是既成不变的事实。

本文集所关注的是现代化的几个领域在建筑中的体现。建筑既是思想的产物, 也是创造思想的手段; 以语言为根基的思想是抽象的构造, 而以物体和空间为中心的建筑可

7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94).

8 例如, 社会学家 Lash 运用领域的概念, 认为现代化在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在绘画与宗教, 17 世纪表现在哲学, 18 世纪和 19 世纪表现在小说, 而 20 世纪表现在建筑, *Another Modernity, A Different Rationality*, 第 19 页。Bruno Latour 给现代化的讨论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 他认为现代化只是理想, 而现实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Is Re-modernization Occurring - And If So, How to Prove It?: A Commentary on Ulrich Beck”,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 (2003), 第 35~48 页。

以看作是基于实体的叙述。可以说，在以上所述的现代性的各个抽象构造中，建筑都在材料、技术、功能和形体等各方面有所回应。建筑物的实体性和空间性可以认为是思想形成的关键部分，这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等精辟的空间分析中可以看到。在17世纪，法国科学家/建筑师克劳德·佩罗（Claude Perrault）对维特鲁威《建筑十书》的修订、考古学家安托万·德斯格特（Antoine Desgodets）对古迹的忠实测绘、英国科学家/建筑师克里斯托夫·雷恩（Christopher Wren）和罗伯特·虎克（Robert Hooke）将建筑置于实验知识（experimental knowledge）的框架中，都是科学思想对建筑陈规的挑战。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为19、20世纪建筑的现代化开拓了途径。今天城市的飞速扩张、科技的日益更新、市场的全球化、建筑的标准化和思想的贫穷（例如对机器和生物比喻的依赖）既产生了危机，又孕育了机会。为了探讨建筑在现代思想中的复杂发展过程和具体内容，本文集对建筑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实事描述，希望能在一定的历史场景中，通过实例表现出现代思想中的建筑。这本文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论述了英国建筑与早期现代思想的关系，中国建筑与中国20世纪初的现代化的牵连，以及建筑评论选。在这些论文和评论中，建筑所涉及的现代思想领域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科学理性与建筑，民族国家与历史，品位与美感，以及理解培养“制作技艺”的重要性。

科学理性与建筑

科学理性的出现是现代思想中最早、最核心的内容。从17世纪欧洲开始，科学理性向以托马斯·阿奎那斯（Thomas Aquinas）为代表的中世纪教条化的亚里士多德理论提出了挑战。这其中的革新包括了两个部分，即知识的内容和知识的结构。当时影响甚大的哲学家培根和笛卡儿分析了中世纪教条知识的症结，提出了新知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计划，这在欧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培根以“实用”为前提，以“感官”为手段，为科学知识制定了新的框架；而笛卡儿则在理论上定义了人与物体之间的主客关系，以及普遍的时间与空间概念。

本文集的第一部分涉及英国建筑与英国 17 世纪科学革命思想成就的关系。当时，英国虽然处于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化的边缘，但同时又处于一个新现代思想的开端。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种文化相比，17 世纪欧洲的知识成就在表面上并没有显得很突出。但在两百年之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很快发展成为世界贸易和科技的领导者，其文化成就对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思想在英国的发展，其表现之一在于对权利、威力、实用性的理解和追求，这与培根的英国经验主义思想有着根本的联系。培根与他的追随者们坚信感官对知识形成的重要性，坚持知识必须与用途结合，并认为只有这样的知识才会带来真正的力量而不是虚无的争论。在这个学术十分活跃的时期，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和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权力和威力作出了分析定义，写出了影响至今的著作。《克里斯托夫·雷恩与培根思想》一文将建筑师及科学家雷恩和虎克置入英国经验主义思想之中，试图分析他们所创造的英国建筑在功能、形象和内涵方面如何继承和突破欧洲巴洛克风格。他们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 17 世纪早期的现代思想，把建筑和科学进步置于同一个思想框架里，为建筑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欧洲 17 世纪科学理性的出现为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因素，即科学与进步的观念。从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到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启蒙运动将科学与进步的理想运用于知识和生活的所有方面，坚信这样就会达到理想社会的永久和平和幸福。但在达到这个理想的过程中却导致了帝国的剥削、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及对自然环境的摧毁。即使是这样，当 19 世纪欧洲帝国主义霸权扩展市场时，启蒙运动的科学与进步的观念还是迅速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个地区。

在中国学术传统对现代思想的回应中，梁启超提倡对中国传统知识在内容和结构上予以更新。梁启超将培根视为“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衔接了英国 17 世纪的思想发展和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梁启超在谈到“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时，总结了现代思想的重要性：“近世史与上世中世特异者不一端，而学术之革

9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二卷《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第1030~1035页;另参见《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第557~560页。

新,其最著也。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术,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⁹ 19世纪末,中国统治阶层提出的“自强”改革计划,以及朱启钤、梁思成、林徽因和刘敦桢对《营造法式》的修订,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国文化和建筑知识的更新过程。《重构中国营造传统:20世纪初期的〈营造法式〉》一文从某些方面叙述了这个知识更新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这里,朱启钤1925年修订的《营造法式》担负了一个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既是考证传统中凝固在时间里的永恒典籍,又是更新中国建筑传统的关键步骤;另一方面,欧洲启蒙运动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则为梁思成、林徽因和刘敦桢研究《营造法式》提供了与传统有根本区别的历史框架,将中国文化语境与现代思想的科学进步联系在一起。

民族国家与历史

10 按照 Elie Kedourie 的经典定义,民族国家是19世纪初在欧洲发明的理论,其宗旨是人类自然的群集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而民族国家的唯一合法制度是自主, *Nationalism*, 4th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4)。

11 Benedict Anderson 认为,所有不是面对面交流的集体观念都是想象的概念,而区别想象集体的标准不是真假,而是想象的方式: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1991)。

12 Jürgen Habermas,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Praxis International* 12:1 (1992), 第1~18页。

民族国家是现代化自19世纪以来的重要领域,¹⁰ 是社会群体(如家、家族、国家)和信念群体(如教会、教区、国教)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作为“想象中的集体”,¹¹ 民族国家具有非常复杂的内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意识形态的权力中心都可以用民族主义来维护其权力的合法性。早期的民族国家大多建立在共同种族、文化、语言之上,而近期的民族国家则可以建立在市民参政以维护市民权利的基础上;在某些地区,国家可以说已从无意“继承”的政体转变为有意“建立”的政体。¹² 虽然早期的现代思想通常具有“全人类”平等的理想,但是在这个口号下的现实政治却往往导致帝国主义的出现;而在帝国最终无法维持时(如20世纪的英国、德国、日本),民族国家则成为现代化最有效的单元。与帝国的性质不同,民族国家是自发的现代化,而每一个单体的出现,都包含了原创性的可能。19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并不是自发现代化的第一次表现;文艺复兴在欧洲各国的迅速扩展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前奏,也是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文化发展的早期。虽然民族国家在政治上的表现不可预料,但它在思想上的表现却在一定时期内十分一致: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最核心的思想支柱是民族历史,以及与其相应的世界历史。

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是黑格尔对现代学术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民族历史不但给民族国家提供了存在的基础（民族文化的来源，民族英雄的奋斗），而且将民族国家置于世界时空之中。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世界精神”认识、发展、完善自身的过程，而历史在各个民族中的发展是世界精神在“民族精神”中的不同表现。19世纪末，在欧洲各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对历史的运用或误用也许是其中心论题；¹³ 但在中国，正如梁启超所意识到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和建立历史。1902年梁启超流亡日本时在《新民丛报》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提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¹⁴ 梁启超特别重视西方史学在其文明中的作用；1922年，他在一篇颇具影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陈述道，新史学的最终目的是将中国民族置于国家的标准之下，去看待它的过去、它的特征以及它在全人类中的位置。¹⁵ “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¹⁶ 梁启超的新史学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中心命题，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以及现代史在建立中华民族国家和中国现代化的叙述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20世纪初中华民族国家的出现、史学的变革以及中国传统的更新与运用，对中国建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民族意识的根基在于日常的重复，那么建筑的物体性则是民族意识有效的表达途径。从朱启钤、陶湘到荷西、墨菲、吕彦直和杨廷宝，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和建筑师在建筑实践中探索了“中国建筑”的具体内容。在编写中国建筑史这一工作中，梁思成、林徽因和刘敦桢等为中国现代建筑以及中华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在《梁思成与梁启超：编写现代中国建筑史》一文中有所论述。在梁启超提出的史学框架中，梁思成、林徽因和刘敦桢运用了现代史学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突出了实地考察和测绘在叙述历史中的重要性。他们的成就为20世纪中国建筑思想和实践提供了关键的参照点。从民国时期的“中国固有形式”到20世纪中后期的“民族形式”，民族文化特征在建筑中的表现对不同政治目标都显得十分具有吸引力，而今天在“地域主义”的推动下这仍然是中国建筑的中心论题之一。

13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法国学者Ernest Renan对“误用”历史是民族国家的共同特征一说，“What is a Nation?”，in Homi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14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卷，《新史学》，第736页。

15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七卷，《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091页。

16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七卷，《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087页。

认识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种族、政权、文化）是理解民族国家的有效途径，也是把握中国建筑在新民族主义中发展的重要手段。民族主义不但是“两面神”（同时面向过去和将来），而且有双重性格（同时容纳邪恶和自强）；民族主义中的民族历史和建筑在 19、20 世纪的中国建筑中有充分的表现。

品位与美感

现代主义文化中的一个重点是对“美感”（aesthetic experience）的认识，因为自 18 世纪以来美学（对美感的分析理解）与传统美（建立在重复与礼仪上的美）已经有了概念上的区别；几乎每个主要的哲学理论都有其相应的美学理论。现代主义美学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的外在表现，以及“现代人”的形象塑造。现代文化中品位标准可以追溯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在 15 世纪文艺复兴早期，这种文化修养的影响是极大的。在佛罗伦萨梅第奇家族（The Medici）所建立的圈子里，古希腊文化和柏拉图的知识，以及这些思想在绘画和雕塑中的物化，成为最流行和最受尊重的文化特征。这个时期的成就对欧洲艺术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其中，费奇诺（Marsilio Ficino）与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对柏拉图思想的继承和将其与基督教的结合，以及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对古希腊罗马神话的研究，为欧洲宫廷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艺术成就成为划分高尚与庸俗、现代与传统标准。绘画、雕塑、音乐，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建筑，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成为现代化的第一个领域。在这里，基督教的线性时间概念、教会无边界的空间观念、古希腊的民主自由、制作技艺（techne）、积极生命（vita activa）和思维生命（vita contemplativa）的结合形成了极具创造力的混合；这是一种与基督教精神文化很不同的“物质文化”。这种物质文化在 17、18 世纪欧洲演变为宫廷礼仪的基础。巴尔达萨雷·卡斯底格朗（Baldassare Castiglione）的《宫廷人物》（Il libro del Cortegiano），将文艺复兴的新型“现代人”描述的非常透彻；新型宫廷人物充分具备了对哲学的精通、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对公共政治事务的处理技巧和在战场上的英勇。该书很快就被译成欧洲各国语言，影响极大。

在这个背景下,各种艺术发展迅速,并产生了通俗易懂的规则,如绘画的五个部分、建筑例书、柱式图样,等等。

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之一出现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英国。英国宫廷在17世纪中叶虽然在极力模仿意大利和法国的新文化,但是它还处于文艺复兴的边缘,其文化发展远远不如法国;但18世纪初,英国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宫廷之外的“富有阶层”的出现,在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迈进了一步。在这个时期,英国文化发展的中心是“高尚品位”的普及,并将品位看作是“社会道德”的外在特征。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富有阶层更关心他们在文化中的定位,从而关注以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著作和作品为中心的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道德感与设计》一文指出,英国贵族成员沙夫茨伯利伯爵三世(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1713年)的著作反映了英国贵族和富有阶层对古典文明和建筑的向往,在英国和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启蒙运动奠定了部分基础。在建筑中,安德烈亚·帕拉第奥(Andrea Palladio)的建筑在英国特别受到关注,逐渐成为消费文化中的社会情操和审美观的象征。

18世纪中期,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将对品位的研究称为“美学”(aesthetics);但也许康德的美学理论是最有影响力的。康德在完成他对“纯理性”和“实用理性”的论述之后,提出了“品位的判断”这一基本概念。¹⁷值得一提的是,沙夫茨伯利在这里对康德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对康德来说,理性的判断与品位的判断产生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基于两种不同的认识力量:理性依赖的是认识性和概念性(semiotic)的运作,而品位则利用直观的和模仿型(mimetic)的想象,两者都是指示真理的手段。理性判断以抽象的数学逻辑(事实、系统、分析、推论)来建造现实,而品位判断则以实体的“间接现实”(风格、音响、情节)来示意真理。运用这个观点,我们也许可以说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建筑是概念性设计(重视抽象形式、无质感材料),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建筑则是模仿性设计(重视建造系统、材料特征)。¹⁸康德开拓性的著作仍然是今天美学理论和现代思想的重要启发点和入手点。一方面,美感可以看作是来源于现实的一

17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Werner S. Pluhar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1987).

18 Lash, "Reflexivity and its Doubles: Structure, Aesthetics, Community", in Beck, Giddens,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第137~138页。

种固定表现，一种基于黑格尔式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美学思想（如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另一方面，当对于系统压制的概念批判（如哈贝马斯的批评）遇到困境时，美感可以成为切入系统概念之中的尖锐手段；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特奥多尔·W.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詹姆逊等认为美感比概念思维更能有效地达到真理、抵制文化工业、形成自主的空间。

重视“制作技艺”

制作技艺（*techne*）也许在其他学术范围内不是现代思想的中心领域，但它在中国建筑现代化过程中却是最中心，又是最常被忽略的部分；而忽视的原因之一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技艺”的理解和实践。制作技艺在欧洲许多文化中有很深的基础，在建筑理论和实践中，制作技艺也许在“建构”（*tectonics*）这一概念中有一定的表达，但建构不能充分体现制作技艺的深刻思想内容。不能否认，建构是制作技艺的一部分，这一点能从两个词共同的拉丁词根中看出。但制作技艺不同于建构，对制作技艺的理解最有效的方法是回到古希腊知识传统中“技能/艺术/知识”（希腊人称为 *techne*，罗马人称为 *ars*）的概念；“制作技艺”在中文里不固定的翻译（技术、艺术、技艺）表现了这个概念在中国建筑文化中的生疏。

简单来说，中国传统中的“技艺”的高度发达，是建立在以自身为参照点的技艺之上。以建筑为例，中国传统建筑是建立在单层“柱与屋顶”的结构模式之上，而在级别、功能、思想意义方面的区别则由装饰的“程度”来表达，如数量、大小、颜色、材料和画饰等。建筑的营造模式并没有改变。这样的建筑系统形成了一种与功能相对隔离的，以自身为参照的结构系统，成为内涵的“象征”；在学术上，这种将内涵与制作相隔离的实践传统可以用本末、体用、道器等观念来表达。这个制作传统在文化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但导致了知识传统对内涵的重视和对外表技艺的轻视（雕虫小技），而且突出了“标志性特征”（颜色的鲜艳与材料的珍贵），而忽视了“制作性特征”（结构和材料的合适运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也更加重视思维而

轻视制作。古希腊的制作技艺与中国对技艺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如果希腊哲学表达了人类生存的抽象理想，制作技艺则是他们认识世界、生存于世界的具体表现，两者的重要性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希腊的圆形剧场在声学、功能和建筑上的成就可以说是其基于民主政治生活方式的制作；圆形剧场这一“制作技艺”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民主政治理想的一个层面（市民的公开辩论和决定）。

与许多现代思想的内容一样，古希腊的成就只是一个雏形。对制作技艺的重视在欧洲中世纪得到了巩固，这在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提的中世纪修道院中修士“克服对劳动的耻辱感”这一发展中表现出来。¹⁹在这里，深信基督教的修士将体力劳动转变为“祈祷”的一种方式（ora et labora），将手的果实放到精神成就的地位之上。这个发展在早期文艺复兴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希腊传统和中世纪发展促进了文艺复兴积极生命与思维生命的结合。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菲利普·布鲁乃列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等文艺复兴的大师都曾在铁匠作坊里实习，在体力与脑力结合的劳动中培养出他们的机械、解剖、建筑和材料知识，以及灵活运用这些知识的制作技艺。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对“制作”（work）与“劳动”（labour）的区别是对制作技艺的重新重视，虽然她所用的词汇有所不同。²⁰她认为，“制作”和“劳动”是截然不同的活动：劳动者（animal laborans）用身体的艰辛劳动维持生命，以“与自然保持同步的新陈代谢”；而制作者（homo faber）则是在创造生命需求之上的成果。阿伦特对制作的理解重新回顾了古希腊对制作技艺的重视，并对现代“劳动社会”和“消费社会”作出了批评。在今天，阿伦特的思想也可以被视为对文化工业的批评。

《重构中国营造传统：20世纪初期的〈营造法式〉》、《20世纪初期的〈营造法式〉：国家、劳动和考据》、《劳动，制作与高密度居住》和《儒家传统和中国建造技艺》等几篇论文和评论，讨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技艺传统和制作技艺的思考。19世纪末，中国文化传统受到制作技艺已高度发展的西方各国的冲击，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制

19 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Inc., 1989).

20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and 1998).

作与威力之间的关系。晚清政府官员致力重构中国的科技传统，提出“自强”的口号，推进了工业、军备、造船和铁路等各项建设，希望通过振兴制作来振兴国家。在朱启铃对传统中国“道器分涂”的批评中，以及对《营造法式》的重新修订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制作技艺更加自觉的重视。他赋予了重新认识制作技艺知识更新的意义。尽管有中国第一代推行现代化的知识分子的努力，制作技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建立仍然十分艰难，特别在今天中国建筑工业空前繁荣的环境中，对制作技艺的重视，学会用双手的制作来思考，是中国建筑理论与实践最大的挑战之一。中国建筑师需要致力于培养对营造的重视，对制作技艺的独创和完美的自豪感，对制作技艺在思考中的中心地位的理解，以及对将头脑带到手中的必要性的领悟。

本文集的动机是建筑实践，是希望把思想与设计的结合转变成自觉的行为，而不只是被动的跟随。这个自觉行为是一种明确的选择，是建立在知识和思想基础上的实践。现代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是间断的和零碎的，而在这种环境中的中国建筑呈现出思想内容的单一，实践中缺乏原创性。对现代思想的理解和认识是克服中国建筑理论贫困的途径之一，如果哈贝马斯认为欧洲启蒙运动的现代化是未完成的事业，那么在中国它则是刚刚开始。现代化的各种方面，包括可以控制的（如建立科学框架、市场机制）和不可控制的（如科技的逻辑结果、市场的全球扩张、信息科技对人性的挑战）方面在中国都有充分的表现，造成了系统与个体、理性与文化以及机器与人性的多方面冲突；我们如何选择建筑，如何更新和创造设计观念和手法，是中国现代建筑从“地域建筑”蜕变为“世界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士桥

2007年12月

致谢

这里收集的每一篇文章都记录了在过去多年我所从周围的导师、同学、同事和家庭中所吸取的灵感和智慧。虽然这里所罗列的名字远远不能包括所有的人，但表达对他们的谢意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他们的付出超越了回报，跨出了文化、语言、空间的界限。

我要感谢 Roy Landau 给我带来的一系列令人难忘的接触建筑思想的机会，AA 建筑学院是一个令人兴奋，同时也充满了张力的地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建筑师对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十分入迷时，Roy 以研究生课程的形式，把建筑传统研究和现代思想同等看待，远远超出了建筑师断章取义的典型运作。在这期间，我遇到了许多建筑师与对建筑感兴趣的学者和同学，如 Micha Bandini、Charles Jencks、Maggie Keswick、Cedric Price、David Dunster、Anthony Grayling、Mark Cousins、David Schmitt、Valerie McLauchlan、Duncan McCorquodale、Gordana Korolija、Isaac Lerner、Faranak Soheil、Mark Dorrian，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和建筑实践给我带来了许多发展的空间。同时，研究英国建筑学术传统是一个印象深刻的学习经历，这个传统在很多学者的个人和著作中体现出来，其中包括 Peter Draper、Margaret Richardson、Eileen Harris、Michael Hunter、Giles Worsley、John Newman、Edward McParland、Cinzia Sicca，他们在很多方面指导了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关心中国建筑与现代化过程这一问题中，我很荣幸有以下朋友和同事与我一起分享研究的成果，他们是：冯士达、朱剑飞、赖德霖、何培斌、

李一康、廖维武、李晓东、王章大、许亦农、伍江、阮欣、Jeffrey Cody、赵辰，他们形成了一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国建筑的团体，每一次会面都充满了独特的喜悦。过去多年与林少伟、Leon van Schaik、蔡明发等关于现代理论、建筑设计及研究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写作。非常值得珍惜的是与 Ryan Bishop 和 John Phillips 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家庭友谊，这里，文化与知识界限的消失成为思想发展的动力。在多年的交流和合作中，Mike Featherstone 和 Scott Lash 等学者的视野和文化批评理论对我来说即是书本知识又是日常行动。

这本文集的出版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教育部的奖学金以及 AA 建筑学院的多方面资助的结果。清华大学建筑系提供了我第一次学习建筑的环境，曾经指导过我的陈志华、吴良镛、汪坦、吴焕加、李道增、关肇邨、田学哲、胡绍学、彭培根、单德启、羊镕等多位老师至今仍是我从事职业中的榜样。沙夫茨伯利伯爵十世在各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包括在 Dorset 的家族庄园的热情招待，以及允许我在这里使用沙夫茨伯利伯爵三世的肖像。Kerry Downes 及牛津 All Souls 学院 (The Warden and Fellows) 允许我使用雷恩建筑和草图照片，在这表示感谢。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林洙女士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不但给了我动力，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今天而理解过去的视野。大英图书馆、英国档案局、英国建筑图书馆、伦敦 Soane 博物馆、AA 图书馆、牛津基督学院、牛津 Bodleian 图书馆、伦敦国家肖像图书馆、宾西法尼亚大学建筑档案馆 (特别是 William Whitaker)、宾夕法尼亚大学 Van Pelt 图书馆史料部、南京中国国家第二档案馆、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和中文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图书馆，都在各方面无私、准确和快速地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服务，为现代开放的学术精神提供了具体的内容。《重构中国营造传统：20 世纪初期的〈营造法式〉》与《梁思成与梁启超：编写现代中国建筑史》两篇论文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经费所支持的研究成果。

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我非常感谢多位研究生的努力，他们为搜索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并为跨越不同语言的迷阵付出了极大的艰辛。文集初稿的翻译者分别是：